

吐鲁番出土《千字文》习字残片与唐代西州童蒙教育

帅琼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2日

摘要

本吐鲁番出土的《千字文》习字残片, 将唐代宏观教育制度与微观书写实践紧密联结, 为考察西州童蒙教育的实际形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视角。本文以阿斯塔那、巴达木、洋海等墓地出土的《千字文》习字残片为核心材料, 通过类型学分析、书写特征考察与出土情境解读, 系统探讨唐代西州童蒙教育的教材来源、教学实态、主体构成及其文化意义。研究发现, 西州《千字文》习字残片可分为范本型、练习型、作业型三种类型, 完整呈现了“单字重复→短句临摹→整篇抄写”的教学阶梯; 纸鞋残片与令狐慈敏习字文书相互印证, 揭示了官学、私学、家庭教育三元并存的教育格局; 《千字文》文本与传世本高度一致, 证明唐代教育制度在西域的标准化推行。这批残片不仅是西州童蒙识字教化的工具, 更是唐朝通过文化教育实现边疆治理、构建国家认同的见证。

关键词

吐鲁番文书, 童蒙教育, 《千字文》, 习字残片

The Discovery of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Writing Fragments in Turpan and Tang Dynasty Literacy Education in Western Regions

Qiong Shua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March 3, 2026; accepted: May 15, 2026; published: June 2, 2026

Abstract

The unearthed fragments of the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from Turpan demonstrate the close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ang Dynasty’s macro educational system and micro-level writing practices, providing invaluable physical evidence for examining the actual form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Western Regions. Using fragments excavated from Astana, Badamu, and Yanghai tombs as core materials, this study employs typological analysis, writing feature examination, and contextual interpretation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textbook sources, teaching practices, participant composition,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Tang-era Western Regions. Research reveals that Western Region’s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fragment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model texts, practice materials, and homework assignments, systematically demonstrating a teaching progression from “single-character repetition → short sentence imitation → full-text copying”. The discovery of paper shoe fragments corroborates Linghu Cimin’s writing records, revealing a tripartite education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official schools, private academies, and family education. The high textual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manuscripts and extant copies confirms the standardized implementation of Tang educational polic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These fragments not only served as literacy tools for Western Region children but also stood as testament to the Tang Dynasty’s use of cultural education to govern frontier territories and construct national identity.

Keywords

Turpan Manuscript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Fragments of Calligraphy Practi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唐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其教育制度的完善与边疆推广，对文化整合和社会稳定起到关键作用，唐代中央政府曾通过设立官学、颁布教材、规范教学内容等方式，在边疆推行标准化教育体系[1]。西州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既是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枢纽，也是中原文化向西域传播的核心区域。吐鲁番特殊的气候条件留存了大量纸质文书，其中《千字文》习字残片成为研究这一历史进程的独特实物证据——它们记录了唐代西州童蒙教育的具体实践，也反映了中央政令在边疆的执行力度。

随着吐鲁番地区各类墓葬文书的大量出土，作为唐代西州童蒙教育核心实物的《千字文》习字残片逐渐进入学界视野。1954年出版《吐鲁番考古记》[2]，已见《千字文》习字残片的零星遗存，虽未做专门考释，却为后续吐鲁番童蒙文书的系统整理提供了初始素材。吐鲁番出土《千字文》习字残片的系统整理，始于唐长孺主持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工作，分为《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十册与《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四册，收录了阿斯塔那等墓地出土的残片，共计五片，涵盖规范范本、单字练习、涂改错字等类型，且每件残片均附完整发掘记录，图录本更直观呈现了残片的书写痕迹与物质形态，为《千字文》习字残片的文本比对、书写特征分析提供了权威底本。

姚崇新较早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关西州教育的材料为线索，从官学、私学及教材三方面对唐代西

州教育的实施情况作了系统考察,提出西州教育“在与中原内地保持一致的同时,也具有一些‘地方特色’,这些特色的形成有些可能与高昌国的文化传承有关”[3]。这一判断勾勒了唐代西州教育的基本轮廓,但对其具体教学实态与学童学习过程的分析仍有深入空间。刘安志则从人口迁移的角度入手,考察了唐初西州的人口结构变动,为理解西州教育的接受主体提供了社会史基础[4]。荣新江在整理新获吐鲁番文献时,特别关注了纸鞋、户籍背面复用的特殊情境残片,为探讨西州童蒙教育的物质载体与日常实践提供了新材料[5]。此外,张艳奎通过吐鲁番出土的“博士”相关文献考证了西州教育的官学体系与师资配置[6]。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制度层面的勾勒与文书材料的整理,对残片所承载的教学细节、学童学习过程及家庭教育场景的系统分析仍有待深化。

本文以吐鲁番出土《千字文》习字残片为核心,选取四类典型标本展开分析:基础训练标本为阿斯塔那 216 号墓残片,进阶练习标本为阿斯塔那 151 号墓残片,规范范本标本为阿斯塔那 322 号、222 号墓残片,情境实证标本为洋海一号墓纸鞋残片、阿斯塔那 179 号墓令狐慈敏习字文书。通过梳理残片类型还原西州童蒙教育的教学过程,结合出土情境探析教育主体与社会背景,进而阐释其在民族融合与国家认同中的作用。

在展开具体分析之前,有必要对本文涉及的核心概念予以界定。“童蒙教育”指古代对初学儿童进行的以识字、习字与初步知识传授为主的启蒙教育,其内容涵盖书写训练、典籍诵读与伦理规训。唐代的童蒙教育主要以《千字文》《急就篇》《开蒙要训》等蒙书为核心教材,学童通过抄写与背诵完成从识字到书写的过渡。唐代童蒙教育还有一个重要功能——书法训练,童蒙学童通过日常习字,掌握汉字的基本书写规范与审美范式,为日后阅读经史、应对科举或从事吏职奠定基础[7]。童蒙教育虽然处于教育链条的初始环节,但其规范化的教学内容与方法,直接决定了学童后续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能力。

与“童蒙教育”相关,“童蒙文化”是近年来学术界针对传统“蒙学”研究而提出的拓展性概念。金滢坤指出,“童蒙文化”旨在扩大对中国古代“童蒙”研究的内容和视野,全面了解中国古代童蒙文化,强调多学科协同研究,避免“童蒙”研究囿于儿童教育的范畴[8]。这一概念强调将童蒙教育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审视,不仅关注教学本身,还关注教育背后的社会结构、政治意图与文化认同构建。本文对吐鲁番出土《千字文》习字残片的研究,正是这种跨学科视角的实践——在分析教材形态与教学方法的同时,结合出土情境探讨教育的社会主体与文化意涵。

2. 《千字文》写本形态分类与教材来源

根据书写特征、行款格式与使用功能,吐鲁番出土的唐代西州《千字文》习字残片可分为范本型、练习型与作业型三类,分别对应童蒙教育的不同阶段。

2.1. 三种类型的界定

范本型以阿斯塔那 322 号、222 号墓出土的残片为代表,见图 1、图 2。322 号墓片存 10 行连贯文字,以“日月盈昃”起笔,行款整齐、字迹工整,无任何涂改与错字,纸张为优质麻纸且带有清晰界栏[9];222 号墓残片存 13 行连贯文字,以“饱饫烹宰”起笔,书写风格与 322 号墓一致,界栏规范。这类残片无练习痕迹,书写水平远超普通学童,应是官学或高级私学为学童提供的标准教材范本,供学童临摹参考。

练习型以阿斯塔那 216 号墓出土的残片为核心代表,见图 3。该残片仅见“寒”字书写 5 遍、“来”字书写 4 遍、“张”字书写 2 遍,字迹稚嫩、笔画歪斜且结构松散,无教师朱批与修改痕迹。质地为普通麻纸,无界栏,纸张边缘有自然破损,无完整《千字文》句段,这类残片是西州童蒙教育入门阶段最典型的临摹练习本,学童通过机械重复书写,初步建立对汉字笔画起承、结构搭配的基础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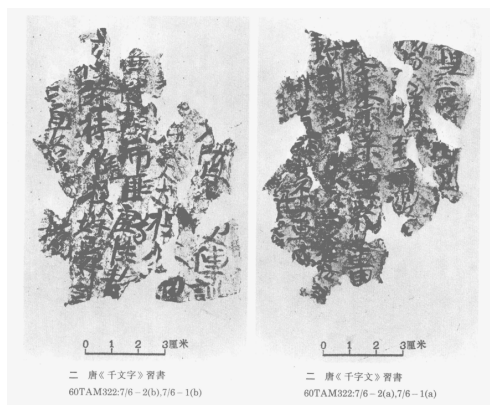


Figure 1. Fragments excavated from Tomb 322 in Astana ([9]: p. 108)
图 1. 阿斯塔那 322 号墓出土残片([9]: p. 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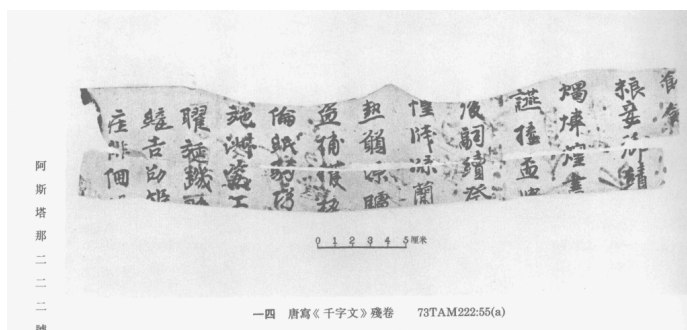


Figure 2. Fragments excavated from Tomb 222 in Astana ([9]: p. 208)
图 2. 阿斯塔那 222 号墓出土残片([9]: p. 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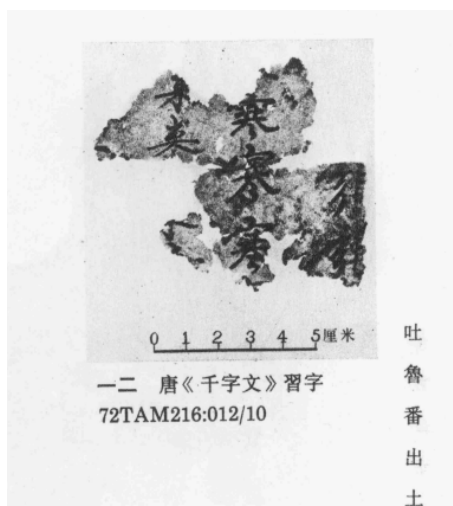


Figure 3. Fragments excavated from Tomb 216 in Astana ([9]: p. 230)
图 3. 阿斯塔那 216 号墓出土残片([9]: p. 230)

作业型以巴达木 115 号墓出土的残片为代表，见图 4。该残片存“耽读玩市”“侍巾帷幄”等半字半句，存在明显的错别字，且不避唐代名讳；阿斯塔那 151 号墓的残卷则有多处涂改墨点，字迹介于稚嫩与工整之间，见图 5。这类残片是学童从单字练习到整篇抄写的过渡阶段作业，反映了学童在学习过程中的试错与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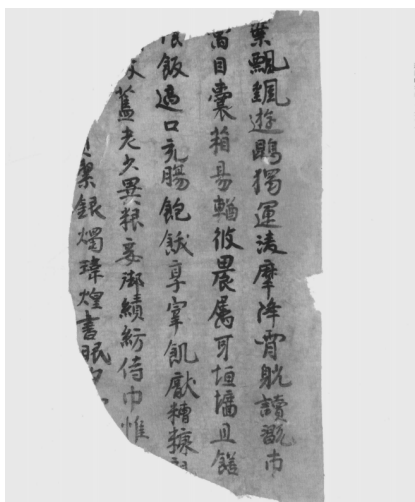


Figure 4. Fragments excavated from Tomb No.115 at Badamu ([5]: pp. 66-67)
图 4. 巴达木 115 号墓出土残片([5]: pp. 66-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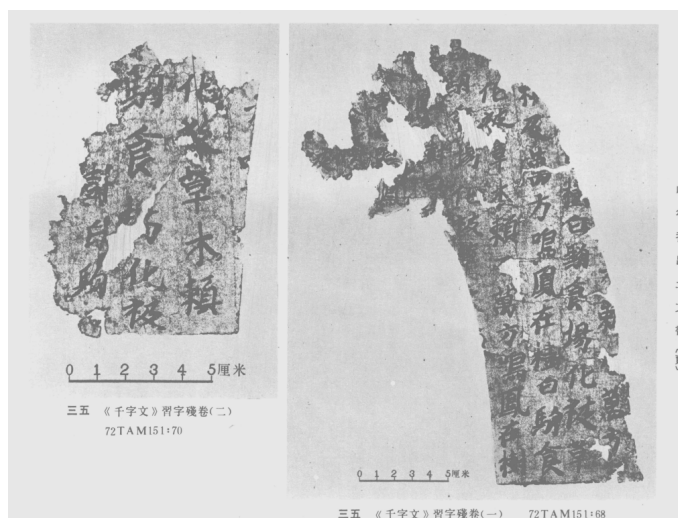


Figure 5. Fragments excavated from Tomb 151 in Astana ([9]: pp. 112-117)
图 5. 阿斯塔那 151 号墓出土残片([9]: pp. 112-117)

2.2. 教材版本的“同文”与“同源”

吐鲁番出土《千字文》习字残片，其文本内容与南朝周兴嗣所撰传世本高度一致，无地域性删改或语序调整。阿斯塔那 322 号墓残片中“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一段，与中华书局刊印的传世本逐字对应；即便是巴达木 115 号墓的作业型残片，其错字也仅为学童书写失误，而非文本版本差异。荣新江指出，吐鲁番出土的汉文典籍写本“保持了与中原传世典籍的一致性”[10]，这一观点在《千字文》残片中得到了实物印证。

教材的统一性源于唐代对边州学校的管理制度。《唐六典》载，国子监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11]，地方官学“取正经为正”[11]，全国科举考试内容统一，这必然要求教材与中央保持一致。唐长孺主持的吐鲁番文书整理工作证实，唐代西州与长安保持着频繁的文书往来，中原经籍通过驿传系统源源不断传入西域[9]。阿斯塔那 322 号、222 号墓出土的范本型残片，其纸张质地、界栏格式与长安地区出土的唐代《千字文》写本一致，进一步证明其是京师颁行的标准教材。从“同文”到“同源”，吐鲁番出

土《千字文》习字残片证明唐代西州童蒙教育在教材上与中原完全同步。

3. 唐代西州的社会背景与教育生态

欲理解唐代西州童蒙教育的具体形态，需先了解其背后的社会基础。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平高昌于其地置西州，下辖高昌、交河、天山、柳中、蒲昌五县[12]。西州地处丝绸之路要冲，东接伊州通往敦煌，南连焉耆，北通北庭。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唐王朝经营西域的根据地。唐朝在此推行了均田制、租庸调、府兵制、学校等与内地相同的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制度[12]。唐代西州的教育制度正是依托这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展开的，它与中原内地的教育体制保持同步。

3.1. 人口构成：汉人聚居与移民背景

唐代西州的居民主要由汉人构成。开元年间西州有户 19,016，口 49,476。这些汉人来源有二：一是高昌国故境的土著汉人后裔，二是由内地徙边的汉民、汉军及其家属，主要来自河西凉、甘、瓜、肃、沙诸州，也有少量来自秦、雍等关中地区。唐朝奖励移民实边，使西州成为汉人聚居的重要区域。除汉人外，西州还有昭武九姓胡人、西突厥等民族，多民族共居是西州社会的重要特征。西州地处多语言、多文化交汇之地，粟特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在此并行使用[13]。在这一背景下，童蒙教育坚持使用汉字《千字文》启蒙，本身就具有文化坚守的意味。移民社会对文化认同的需求，也使得中原教育制度的移植获得了内在动力——通过教育实现文化传承，是移民社会维系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

3.2. 交通网络：文书与教材的传播通道

唐代西州与长安之间保持着频繁的文书往来与文化交流。西州内部建有驿路 11 条，据今存 P.Ch.2009《西州图经》残卷载，计有花谷道、大海道、银山道等。西州东达沙州、伊州，西至安西，北达庭州，都有宽敞的驿路相通。完善的驿传系统为中原经籍、教材的源源传入提供了物质保障。吐鲁番出土的大量唐代官府文书、契约、典籍写本，正是这一交通网络高效运转的见证。唐长孺主持的吐鲁番文书整理工作证实，唐代西州与长安保持着频繁的文书往来，中原经籍通过驿传系统源源不断传入西域。中原的童蒙教材正是经由这套驿传系统，从京师长安颁行至西州各地。阿斯塔那 322 号、222 号墓出土的范本型《千字文》残片，其纸张质地、界栏格式与长安地区出土的唐代《千字文》写本一致，正是教材经由驿路西传的直接物证。

3.3. 教育制度的并轨

唐代在西州推行的教育制度与中原内地完全并轨。贞观十四年(640年)唐置西州后，设立了一套完整的中原管理制度，教育制度自然也与中原“并轨”，当时唐朝在高昌地区开办与中原地区相同的州学、县学、乡学。西州依《唐六典》的规定设州学、县学，配备经学博士与助教，招收生徒。《唐六典》载国子监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地方官学“取正经为正”[11]，全国科举考试内容统一，这必然要求教材与中央保持一致。吐鲁番阿斯塔那 363 号墓出土的卜天寿《论语》抄本，卷末题记“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9]，更直接证明西州私学的存在。官学与私学的并存，使唐代西州形成了完整的教育体系。唐代西州的官学与私学、家庭教育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西州童蒙教育的完整生态。

4. 书写痕迹与教学实态

教材的标准化是唐代西州童蒙教育的“骨架”，而具体的教学方法与书写训练则是其“血肉”。吐鲁番出土《千字文》习字残片保留了大量的书写痕迹——单字重复、涂改错字，这些细节是还原唐代西州童蒙教学实态的关键。

4.1. 一字多书与涂改错字

阿斯塔那 216 号墓出土的练习型残片，最显著的特征是“一字多书”。这种单字重复书写模式，是唐代中原童蒙书写教育中普遍采用的训练方法。《颜氏家训·勉学》提到，童蒙教育“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14]，强调早学的重要性；而唐代通行的教学理念认为，初学书写必先单字精熟。从 216 号墓残片可见，“寒”字的 5 次书写，笔画从歪斜逐渐规整，清晰反映了学童在重复书写中对汉字笔画、结构的逐步掌握。敦煌出土的唐代《千字文》习字残片同样存在大量“一字多书”痕迹，证明这是全国通行的书写教学法。

阿斯塔那 151 号墓出土的作业型残片，保留了涂改与错字痕迹。部分字书写错误后用墨笔直接划掉，部分字的笔画被反复修改。这些痕迹反映了师生之间的真实互动：学童在教师监督下练习，或课后进行自我修正。吐鲁番阿斯塔那 363 号墓出土的卜天寿《论语》抄本中，不仅存在大量错字与涂改，还留有学童的打油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9]，反映了唐代童蒙教育中严苛与包容并存的师生关系。西州作为唐代边疆的重要州府，其童蒙教育的师生互动模式完全承袭了中原传统。

4.2. 从临摹到默写的教学进阶

综合三类《千字文》习字残片，可以构建出唐代西州童蒙书写教学的进阶阶梯：

第一阶段(单字临摹)：以阿斯塔那 216 号墓为代表，“一字多书”训练帮助学童掌握汉字的基本笔画与结构，实现“识得字、写得准”。

第二阶段(短句临摹)：以阿斯塔那 151 号墓为代表，以半字半句的抄写为核心，允许涂改与错字，目标是让学童掌握汉字的连写与句段语序，实现“连得句、通得意”。

第三阶段(整篇书写)：以阿斯塔那 322 号、222 号墓为代表，以连贯的篇章书写为核心，要求行款整齐、无涂改，目标是让学童掌握汉字的规范书写与文本的整体认知，实现“写得整、记得牢”。

这一阶梯式教学路径层层递进，其最终目的并非单纯的写字，而是为学童后续阅读儒家经典、从事基层吏员工作奠定基础。唐代西州的基层吏员需要具备扎实的汉字书写与文本阅读能力，以处理官方文书、户籍档案等工作；而儒家经典的阅读，则是唐代社会主流文化认同的基础。《千字文》作为童蒙教材，内容涵盖天文、地理、伦理、历史，学童在书写训练的同时，也能初步接触中原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念。

5. 出土情境与教育主体

吐鲁番出土的《千字文》习字残片，其出土情境与残片本身同样重要。不同的出土情境反映了不同的使用主体与教育场景，揭示了唐代西州官学、私学、家庭教育三元并存的教育格局。

5.1. 纸鞋残片与家庭教育

洋海一号墓出土的《千字文》习字残片，从墓主纸鞋中拆出[5]。将学童的习字作业作为纸鞋原料，并非对文化的轻视，反而凸显了纸张的稀缺，更折射出普通家庭对子弟学业的高度重视。将“文化”随葬护佑来世，是一种朴素的文化崇拜，也反映了西州平民家庭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向往。除洋海一号墓外，巴达木 115 号墓、阿斯塔那 151 号墓的残片也均出自普通平民墓葬，这些习字作业被有意留存于墓中，反映了家庭对童蒙教育成果的珍视。

5.2. 令狐慈敏习字与私学

阿斯塔那 179 号墓出土的令狐慈敏习字文书，为探讨西州私学教育提供了直接证据。该残片以“過”字的重复书写为核心，教师在残片上朱笔批注“记忆”二字，见图 6。同墓出土的户籍文书显示，令狐慈

敏为西州柳中县的普通百姓子弟，并非贵族或宦宦后代。结合敦煌文书中“私学生”的题记可知，令狐慈敏应是私学学生。西州的私学多由落第文人、退休基层吏员开设，以识字与书写训练为核心，收费低廉，面向普通平民子弟，是西州童蒙教育的普及主体。阿斯塔那 216 号墓、巴达木 115 号墓的习字残片，均为私学学生的作业，证明私学在西州的广泛存在。



Figure 6. Fragments excavated from Tomb 179 in Astana ([9]: pp. 363-365)

图 6. 阿斯塔那 179 号墓出土残片([9]: pp. 363-365)

5.3. 官学、私学、家庭教育三元结构

与私学相对的是官学，以西州州学、县学为代表，面向贵族子弟与宦宦后代。阿斯塔那 322 号、222 号墓出土的范本型残片，优质麻纸、界栏规范，书写水平极高，正是官学使用的标准教材。张艳奎通过吐鲁番出土的“博士”相关文献考证，唐代西州设有专门的经学博士与文学博士，负责官学的教学工作 [6]。官学的童蒙教育不仅包括《千字文》的书写训练，还包括《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的初步阅读，其教育目标是西州培养基层吏员与文化精英。

官学与私学的二元结构，让唐代西州的童蒙教育实现了精英培养与平民普及的双重目标。家庭教育则作为补充，让文化的传播从学校延伸到家庭，三者相互结合，形成了官学、私学、家庭教育三元并存的完整教育环境，让中原的童蒙教育在唐代西州落地生根。

6. 出土情境与教育主体

唐代对西域的治理，并非单纯的军事征服与政治管辖，而是通过文化教育实现“软治理”。吐鲁番出土的《千字文》习字残片，揭示了童蒙教育背后的政治意义，即通过汉字书写与《千字文》的文本教化，将中原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与政治理念植入西州学童心中，构建边疆民众的国家认同。

6.1. 汉字书写与文化认同

唐代的吐鲁番地区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交汇之地，粟特文、回鹘文、于阗文等多种文字在此并行使用。在多语环境中坚守汉字启蒙，并非单纯的“文化偏好”，而是通过书写训练构建边疆民众的华夏文化认同。对于唐代西州的学童而言，学习汉字的过程，就是接受华夏文化的过程，从高昌国时期到唐西州时期，残片的书写风格从“古隶遗意”转变为“唐楷规范”，这种书风的演变不仅是书法风格的变化，更是西州民众政治归属感强化的体现。洋海一号墓、巴达木 115 号墓的普通平民家庭将子弟的习字作业作为随葬品，正是身份认同的直接体现。

6.2. 从识字到忠君的教化

《千字文》并非单纯的识字教材，其文本是中原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念的浓缩。“盖此身发，四大五常”传递儒家伦理；“吊民伐罪，周发殷汤”传递王朝正统观念；“孝当竭力，忠则尽命”强化忠君孝亲的价值。对于西州学童而言，这些语句在书写过程中逐步被植入心中。葛承雍指出，“唐代的童蒙教材，是政治教化的重要载体，其文本内容的选择，始终围绕着大一统的政治理念”[15]。

从识字到忠君，从文化认同到政治认同，唐代西州的童蒙教育实现了层层递进的教化目标。通过汉字书写训练，构建学童的华夏文化认同；通过《千字文》的文本学习，植入中原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念；通过儒家伦理与政治理念的教化，构建学童对家国的认同。当这批学童长大成人，成为西州的吏员、商人、平民时，这种国家认同会进一步传递给后代，形成中原文化在西域的代代传承。

7. 结论

本文以吐鲁番出土《千字文》习字残片为核心，通过类型分析、书写特征考察与出土情境解读，厘清了唐代西州童蒙教育的实施实态与文化内涵。第一，教材移植的标准化。西州《千字文》习字残片可分为范本型、练习型、作业型三类，文本内容与传世本高度一致，无地域性删改，教材由京师颁行，证明唐代教育制度在西域标准化推行。第二，教学方法的完整性。从阿斯塔那 216 号墓的一字多书，到 151 号墓的涂改临摹，再到 322 号、222 号墓的整篇抄写，完整呈现了“单字重复→短句临摹→整篇抄写”的教学阶梯，一字多书的训练方法与中原一致，证明唐代通行的童蒙教学法在西域得到完整复制。第三，教育主体的多元性。洋海墓地纸鞋中的残片反映家庭教育，阿斯塔那 179 号墓令狐慈敏习字文书反映私学教育，阿斯塔那 322 号、222 号墓规范写本与官学制度相关，官学、私学、家庭教育三元并存，共同构成西州童蒙教育的完整生态。第四，文化认同的建构性。在多元语言环境中坚守汉字《千字文》启蒙，通过书写训练传递中原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念，童蒙教育成为唐朝实现西域“内地化”治理的重要手段，这批残片不仅是识字教化的工具，更是中原文化在西域落地生根、国家认同在边疆建构的微观见证。

参考文献

- [1] 张慧芬, 李锦绣. 吐鲁番出土“唐咸亨元年后西州仓曹文案为公廩本钱及奴婢自赎价事”文书考释[J]. 敦煌学辑刊, 2023, 1(1): 52-71.
- [2] 黄文弼. 吐鲁番考古记[M].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辑. 北京: 中国科学院, 1954.
- [3] 姚崇新. 唐代西州的私学与教材——唐代西州的教育之二[J]. 西域研究, 2005(1): 1-10+114.
- [4] 刘安志. 唐初西州的人口迁移[J]. 中华文史论丛, 2007(3): 301-321+370-371.
- [5] 荣新江, 李肖, 孟宪实, 主编.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6] 张艳奎. 从吐鲁番出土“博士”相关文献管窥吐鲁番地区文化教育[J]. 教育史研究, 2025, 7(3): 79-87.
- [7] 蒙天霞. 从敦煌习字蒙书看唐代敦煌童蒙书法教育[J]. 大学书法, 2020(6): 112-118.
- [8] 金滢坤. 中国童蒙文化研究的思路、方法与创新[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 1-5.
- [9] 中国文物研究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武汉大学历史系, 编, 唐长孺, 主编. 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 [10] 荣新江. 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 [11] (唐)李林甫, 等, 撰. 唐六典[M]. 陈仲夫,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12] (宋)欧阳修, 宋祁, 撰.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3] 薛宗正. 唐代西域汉人的社会生活[J]. 西域研究, 1996(4): 74-88.
- [14] (北齐)颜之推. 颜氏家训[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15] 葛承雍. 唐代边疆文化与治理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